

现代性的哲学视域

王振林◎著



■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非虚构

现代性的哲学视域

王振林◎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现代性的哲学视域 / 王振林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8. 7

(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自选集)

ISBN 978-7-5203-2974-3

I. ①现… II. ①王… III. ①现代哲学—文集 IV. ①B1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80371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朱华彬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 // www. csspw. cn](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0
插 页 2
字 数 328 千字
定 价 8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本文集所收入的论文，既记录了我近 40 年来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学习与探索轨迹，又展现了我不同时期的研究兴趣与领域。整个文集由三个部分组成，第一编：移动的地平线：从我思之我到交互主体。纳入本编的论文，虽然涉及的哲学家及其理论较为广泛与庞杂，但是其研究主题还是较为集中的，即以理性、主体与主体际性为主题，研讨了现代西方交往理论。确切地说，对现代西方交往理论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而激发我对西方交往理论与交互主体性问题进行研究热情的契机，乃是读了美国哲学家弗莱德·R·多尔迈的《主体性的黄昏》一书。书中以“思维主体”的争论为话语背景，触及交互主体性、人与自然的关系、社会与个体的发展理论，以及诸种社会政治职责的伦理基础结构这样四个问题域。所有这些问题，不仅引起了我的探索兴趣，也奠定了我的研究领域。

对主体际性问题的研究，起初主要集中于对德国哲学家的理论研究，如胡塞尔的交互主体性理论、海德格尔的共在理论、伽达默尔的语言理解理论和哈贝马斯的交往行动理论。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因为就读的专业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以，又扩展到对马克思主义交往思想，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交往思想与哈贝马斯交往理论之间的比较研究，并由之完成了博士论文。之后便赴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哲学系访学。在这一年的留学期间，又专门收集、研读了与之相关的文献材料。回国后，经过进一步修改与加工，2001 年由国家留学基金资助，出版了《解析与探索——哲学视域中的主体际交往》一书。当然，我曾在该书中说本书并不是“大纸票”而只是“小零钱”，它不过是对交互主体性问题研究的起步而已。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拓展与深入，先后在校、省、部级不同级次项目的支持下，不仅发表了数十篇与之相关的论文，而且在 2015 年年底，由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现代西方交往理论研究》一书。书中不仅涉及德国哲学家的交往理论，同时也包括法国哲学家、美国哲学家的交往理论。

尽管诉诸不同基点上的交往实践理论五花八门，但是交往实践的核心问题实际上集中于：“主体际性是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对“主体际性何以可能”问题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可辩护性与合法性的探索与阐释中，现代西方哲学家都是以人的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为支点，去说明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的网络结构关系，阐明交往实践在人类的文化遗产、历史演进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都是以消解传统哲学的主客二元对立，突破“方法论的唯我论”为其理论的出发点，显示出现代西方哲学在从近代哲学的“观念论”向“语言学”的视角转换中，已由传统哲学囿于意识的观念主体、主客问题的研究转向实践主体、主体际问题的研究，以及越来越贴近生活的“实践转向”。当然，诉诸我思与知觉、经验与语言，超越传统哲学的“唯我论”，追求主体际的交流与沟通，既是对传统哲学的主体性观念进行理论反思与批判而必然逻辑地生成的问题，又是现代西方哲学家对世界多极化、文化多元化与经济全球一体化的时代特征自觉反思而提出的一个前沿性、边缘性与交叉性的热点研究课题。毋庸置疑，在对这个热点课题的研究中，各具特色的交往实践理论之间远未达成共识，存在着不尽相同的思维路向、论证方式与理论构成，而造成诸家诸说纷纭争执状态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们所诉诸的交往实践基点不同。不过，这并不影响它们从不同的边缘域向同一个目标前进，在对交互主体、交往实践的分析与论证中，为我们呈现出了一幅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理论语境。

第二编：追寻美德：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对西方伦理道德问题的研究，萌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攻读硕士研究生期间，聆听了邹化政先生的西方伦理学史课。先生对西方伦理道德问题及其发展史的独到解说，引起了我内心渴求对之进行研究的欲望。在此后20多年的研习与积累的基础上，我不仅发表了一系列相关的研究文章，而且2011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人性、人道、人伦——西方伦理道德问题研究》一书。

纵观西方伦理发展史，可谓学说林立，论点各异，问题繁杂，但是贯

穿于伦理学之中的基本问题就是道德的根据何在？从古希腊开始，人们就一直在混乱不休中讨论道德的根基问题，道德秩序需要一个外在的来源使我们自身被迫与道德要求相一致呢，还是我们善于约束自己以至我们有充分的动机去引导我们去应该做的事情呢？或者说，关于人性之“是”，并从人性之“是”中推导出“我们应如何行动”是理性的召唤，还是支配于我们待人接物时所流露的情感呢？关于道德的基础，尽管不同的道德哲学各有主张，然而，几乎所有这些学说的共同之处是，它们都试图让个人为自己提供道德，同时宣称这种道德具有真正的普遍性。因此，它们“先是描述人类本性的特征；然后作为一种补充物引入道德准则，将其解释为是已经得到说明的人性的表现或者是这种人性满足的手段”^①。但是，对于道德规则，哪一种基础在逻辑上是普适的？道德规则所需要的根据是什么？以往的伦理学或是从上帝的诫命方面，或是从理性的命令方面，或是从实现人的本性的目的方面，或是从听从绝对命令的义务方面，来理解道德之善。这一切又引起了令人烦恼的问题，正是关于这些诫令、命令、目的和绝对命令是由什么构成的问题，是理智与知识，抑或是情感与意志？理智与情感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归根到底与诸家诸说的世界观密切相关，由之便呈现出本体论价值决定了主体性价值，即对理智而言的“真”和对意志而言的“善”。尽管有些哲学家在某种意义上将人的道德生活与他人、社会相关联，但是他们在解释人性时，几乎都是在人的实践行为之外来寻找根据，而没有看到根据就在人的社会历史生存行为本身，意识不到人的行为之道，存在真理只有与人发生关系，才算找到了自我揭示之所，人的自由自觉的社会实践才是伦理学说与一切行为道德的基础和根据。

第三编：理想的冲突：哲学的批判与改造。收集在这部分的文选，反映了我不同时期对不同哲学问题的关注，因而它们并没有统一的讨论主题。《康德范畴理论研究》《黑格尔对康德范畴理论的超越及启示》两篇，是我研究生结业后的习作，主要阐释了黑格尔在对以往哲学，特别是对康德范畴理论的批判与继承、改造与发展的基础上，以概念自身的思存统一

^① [美] 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伦理学简史》，龚群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37 页。

性，克服了康德的思维形式和感性内容的外在结合，以及悟性范畴和外在世界僵硬对立；以概念自身的矛盾运动和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发展，克服了康德范畴之间静止的、非发展的缺陷，揭示了人类由低到高、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抽象到具体的认识发展过程，达到了逻辑学、认识论、本体论的统一，建立起了一个概念的真理体系，从而以唯心主义的辩证逻辑取代了康德的先验逻辑。而其他几篇则从不同的维度研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现代西方哲学在本体论、真理观、生活世界与社会历史等方面的争论与批判、超越与转向。从不同维面所进行的这些研讨，既彰显了哲学的思维方式与问题域的转换，也表现了哲学对自身认识的深化与更新、发展与转向。

王振林

2018年2月于长春农舍

目 录

第一编 移动的地平线：从我思之我到交互主体

从主体理性的凯旋走向理性主体的黄昏	(3)
理性主体与理性批判：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14)
现象学运动中的交互主体性理论统观	(24)
交往实践的基点定位探本	(34)
解析与探索	
——哲学视域中的主体际交往	(45)
“主体间性”是个应该给予消解的无意义的概念吗？	(54)
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理论评析	(60)
走出传统哲学的自我中心困境	(69)
评析伽达默尔的语言理解游戏	(78)
生产、语言与交往——马克思与哈贝马斯	(89)
萨特的他者理论研究	(98)
梅洛-庞蒂：“他人与人的世界”	(110)
现代交往哲学中的实用主义之声	(120)
符号、自我与交往——皮尔士的交往符号学理论	(129)
威廉·詹姆士：超越主客对立的交往哲学	(140)
约翰·杜威与民主交往理论	(151)
米德的“符号互动论”解义	(160)

第二编 追寻美德：西方道德哲学的寻根理路

西方道德哲学合理性基础的摧毁与重构	(173)
“乌托邦”思维与普遍伦理	(186)
苏格拉底：真理、知识与美德	(194)
美的理想	
——中世纪基督教爱观之探讨	(205)
透视后现代伦理学	(214)
两种相悖的伦理话语：罗蒂与哈贝马斯	(220)
伦理道德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	(231)

第三编 理想的冲突：哲学的批判与改造

认知思维方式的生存论转向	(243)
当代实践哲学与生活世界理论	(250)
马克思主义场域中的哲学改造与冲突	(257)
存在主义化的马克思主义	
——述评《辩证理性批判》	(266)
一元史观，还是多元史观？	
——论阿尔都塞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的释义	(274)
康德范畴理论研究	(283)
黑格尔对康德范畴理论的超越及启示	(290)
现代西方哲学的真理观及其启示	(299)
现代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发展趋向与特点	(307)

第一编

移动的地平线：从我思之我 到交互主体

从主体理性的凯旋走向理性主体的黄昏

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原则与奠基石。近代哲学通过弘扬人的主体理性的完善性，确定了人的理性主体地位，从而取代与颠覆了中古时期存在理性与神的至高无上的中心位值与权威。然而，随着人的主体理性不断强化与无限膨胀，不仅愈来愈暴露出隐含在它自身中的缺失与弊端，同时又为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丧失埋下了危机的祸根。在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哲学的极致之后，近代哲学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主体形而上学迅速失去了往日的无上权威，陷入了“四面楚歌”的深刻危机之中，遭到了现代西方哲学诸思潮的反思与批判、匡正与重构，导致并加速了近代哲学的主体理性概念的统一性、绝对性的衰落与崩溃，理性主体也随之走向了黄昏。

—

近代哲学的梦想与努力完全是凭借主体自身的理性力量，回归并确定了人的理性主体本位。然而，近代哲学以“方法论的唯我论”作为主体理性确定理性主体本位的方法论前提，势必使得近代哲学一开始便在主体理性的独断中，使理性主体与自然、社会之间处于分离、对峙的状态；并在主体理性一无止境的扩张与膨胀中，使得力图通过人的主体理性以确定人的理性主体本位的近代哲学努力，演变成人的理性主体既未真正地得到表达及其位值，反而在理论的逻辑发展与现实的经验实践中，走向了“人的终结”。

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命题历来被看作西方哲学进入近代的标志。他以一种空前彻底的“中止判断”的批判怀疑式，对一向被当作毫无疑

间的、不言而喻的感性经验世界和一切从它那里派生出来的科学的、非科学的思想生活的有效性的质疑，以及向“我思”这一绝对必真的自明性的回归，不仅充分肯定与显示了主体理性的无上权威与主导地位，开启了一种对客观的认识进行彻底批判的“认识批判史的开端”，使哲学的研究视角从原先的“以心向外”转向“反身内求”的“哲学的新时代”。而且，通过主体的“我思”确立了“它的自我存在”，提出了一种在“自我”的主观性中寻找世界和客观真理的最终根据的“哲学研究的全新模式”。这种要求回溯到“无可置疑的自我”中去，并从主体理性出发，在“主观性”中寻求一切科学知识最终根据的“唯我论”的哲学研究方式，在他以后的近代哲学理性主义的宏大系统中充分显示并发挥了它的内在力量。近代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尽管在主体理性的真理性与确定性的基础上存在着分歧与争端，但是探索与立足于主体理性或自我意识，并将其作为理性主体认识的出发点与归宿，作为科学知识 with 认知真理的确定性基础与标准，则为二者共同的哲学取向及方法论基础。这种基于唯我论的方法论在康德的先验哲学中进一步发扬光大，其历史影响一直延至今日。诚如胡塞尔所说：“笛卡尔的不作任何预先假设的激进主义及其追溯一切真正的科学认识的最终有效性的源泉和由此出发绝对地奠定它们的基础的目的，要求转向研究主体，要求回溯到那个在其内在性中进行认识的自我中去。不论人们如何不赞成笛卡尔的认识论的程序，人们已经不再能够逃脱这种要求的必然性了。”^①

然而，近代西方哲学要求回到主体理性或“我思”的动机，以及由此所展现出来的对理性主体的迷恋，所付出的代价是：“作为‘对其尊贵的惩罚’，认识论的主体被‘永久监禁在它的自我之中’，被判定象‘城堡中’的骑士那样去看世界。”^②所以，近代哲学一开始便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把人摆在主体的位置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分离与对立。人作为“一个最初无世界的主体”，不仅同与他人打交道的生活世界相剥离，而且也同与之认识和改造的自然世界相剥离。那么，经过双重剥离的理性主体作

^① [德]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07 页。

^② [美] 弗莱德·R. 多尔迈：《主体性的黄昏》，万俊人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8 页。

为认知者或主观思想者，其任务主要在于认知与符合外在客体对象，以主体理性或“我思”为轴心去消除理性主体与客观存在的对立与矛盾。无论经验论基于感性经验与唯理论基于理性观念所采取的运思路数如何相左，无论人的主体理性如何与客观存在处于尖锐的对立与矛盾中，二者都毫无疑问地既肯定主体理性的自明性，又相信主体理性的客观实在性。近代哲学对主体理性的自明性与客观实在性的非批判的独断论，最终在休谟的怀疑论中又发展成为不可理解的荒谬。休谟通过心灵联想律，不仅以非理性的习惯联想破坏了主体理性的普遍性、必然性与客观实在性，而且以其前后一致的彻底的经验主义的怀疑论终结了理性主体与客观存在的统一性。康德通过理性的批判及他称为“哥白尼式的革命”，虽然在经验的领域恢复了主体理性统摄感性形象而形成知识的客观有效性与理性主体为自然立法的权威性。但是，主体理性的经验的客观有效性，使得理性主体只能作为经验自然界的立法者限囿于此岸世界，而与彼岸世界——物自体永远处于无知无识的对立之中。主体与客体、理性与物自体之间的对立与矛盾，在经历了费希特、谢林哲学的修正与整合之后，在黑格尔的理性既是存在实体同时又是认知主体的自我外化与自我认知的同性相知的泛理性的辩证发展中，虽然达到了统一，但这种统一是以恢复存在理性的实在性，牺牲人的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实在性为代价的。

存在理性问题的再次浮现，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危机，实际上是建构在主体理性“唯我论的方法论”基础上的近代主体性哲学逻辑发展理路的必然结果。笛卡尔要求回到自我中去的动机以及当这种动机彻底地把自己发挥出来时，本质上是一种纯粹以主体理性的活动为根基，去确定理性主体的存在并将其作为一切知识生成的最终源泉的理性主义，这种理性主义所内含的偏颇与荒谬一开始便为其走向危机埋下了种子。“我思”作为“我在”与知的基础，在实质上它只是自我关系的理性思维活动的自我反思；“我在”作为一个“无世界”的片面的、抽象的“理性”认知的负荷者，也不过是心灵、精神、理智的同义语。因而，整个认识的、超验的问题集与其说是围绕着理性主体，不如说是围绕着心灵或主体理性而旋转。结果笛卡尔通过“我思”以企“自我”的哲学预设与目标，则在把自我等同于心灵或“纯粹灵魂”的荒唐曲解中发生了偏离并失去了意义。在此，理性主体偏离了它的中心位值，占据轴心的是主体理智与心

灵。笛卡尔的主体理性原则所产生的哲学效应，以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不同运作方式有力地向前推进着。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哲学家们在追溯那个无可置疑的自我中去的时候，自觉不自觉地便随着笛卡尔把这个自我解释为“纯粹心灵”。洛克通过“白板”来解说心灵的实在性；贝克莱则发展为“存在就是被感知”；休谟进一步发展并拘泥于整个心灵、“印象”与“观念”，以及属于这种心灵力量的世界本身。康德在反对休谟的内感材料实在论的基础上，以先验的主观主义形式发挥了笛卡尔的主体理性原则。如果说笛卡尔只是把知识的可靠性建立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那么，康德则更进一步把人的一切知识与实践都统一在主体理性的基础上。主体理性作为知识可能性之条件，形成给自然立法的理论理性，作为道德实践行之必然条件，形成给人立法的实践理性。自然与道德、科学与哲学、理论与实践最终都源自并统一于一个先验的主体理性。先验的主体理性这种普遍的、绝对的统一性如此发展下去，在黑格尔哲学中终而极化为脱离并制约人的理性主体而存在的绝对理念的实在性。人的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变成了存在理性实现自身的表现者或工具，完全丧失了自身的权威性与主动性，从而使得近代哲学所开创的以人的主体理性以迄人的理性主体的哲学走向失败。

这种失败既是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又是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近代哲学的理性、主体精神，在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的一往无前的理性扩张与僭越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表现为加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鸿沟以及战争、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对人自身的惩罚，而且表现为人的理性主体变成了主体理性自身的创造物——工业化大机器的附庸与工具。人的理性主体的自由与解放在经历了几度潮起潮落之后，人又一次痛苦地发现，人并未如其所期望的那样尝到主体理性的胜利果实，相反，却在人的主体理性的狡黠中，又一次发生了主奴颠倒，变成了没有主体个性、没有自我，只是执行机器功能的部件和工具。人再度面临着如何从人的主体理性的造物的惩罚、贬抑、物化的“自我灭绝”中获得自主和解放的问题。如同雅斯贝斯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所揭示的那样：“今天，那种想要认识一切的骄傲以及把自己看作世界的主人，从而想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的妄自尊大，叩响了所有的大门。但与此同时，这类骄傲与自高自大所遭到的挫折又引起了一种可怕的虚弱感。”理性主体“存在的基

础仿佛已被打碎”^①，主体理性唯我独尊的权威性受到了质疑。

二

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力量的丧失，为一个哲学的新时代和它的一切发展序列的开端，奠定了最初的基础。然而，近代哲学是建立在理性原则基础上的主体性哲学，并未能在实际上进一步发挥作用，与那种进一步发展它和在新的基础上巩固它的企图相反，它激发了一场革命性的、或多或少是根本性的重新铸造的过程。在这场革命性的匡正与重构中，尽管诸哲学流派的理论基点、运思架构及哲学鸩的均有差别，但无论它们是循着理性主义之道，还是沿着非理性主义之路，其理论重铸的结果是：近代哲学主体理性的一统天下，在西方现代哲学各种不同思潮的批判与瓦解中分崩离析；理性主体在其获得新的规定性与内涵中也随之失去了以往那种唯我独尊的宇宙霸主地位。

实证主义与科学主义对形而上学可能性的怀疑，对普遍哲学信仰的崩溃，实际上意味着对主体理性信仰的崩溃。科学主义对经验事实与实证科学的青睐，造成了它把一切需要从主体理性出发来思考和回答的普遍的、必然的哲学问题，都当作无意义的超验的“形而上学”命题，完全排除于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而将主体理性仅局限于纯粹经验事实的领域，变成了专门对科学的、常识的命题与知识做逻辑分析演算与论证的工具与方法。这样，它不仅限定与改变了主体理性的范围、性质与功能，而且随之也完全舍弃了近代哲学孜孜以求的理性主体问题。在此，科学方法论取代了理性认识论，工具理性取代了认知理性。主体理性作为只是对科学的、常识的命题进行逻辑操作与论证的规则、方法与工具，不再是真理与价值、认识与实践绝对的、永恒的、无条件的有效性基础。主体理性工具化为非主体、非主观的而只具有形式与方法特质的“残缺不全的概念”，那么，与之息息相关的本质规定性：意识、自我意识、理性主体则变得毫无意义与存在价值。近代哲学的主体理性概念与理性主体原则，在理性主义哲学内部发生了动摇与瓦解，即在科学主义思潮这样一种只局限于自然科

^① [德] 雅斯贝斯：《时代的精神状况》，王德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

学的研究领域的狭隘的理性主义的反思与检讨、匡正与重构、批判与排斥下，陷入了深刻的危机。批判理性主义者霍克海默与现象学大师胡塞尔分别在各自不同的著作中揭示了这种危机的实质与荒谬性。霍克海默在《论理性概念》一书中一针见血地指出：主体理性一旦成为工具，人也就成了手段，成了工具而不再是目的了。这样由启蒙运动开始的基于主体理性、基于主体理性的洞见，来反对神话与迷信的精神要求，到头来似乎正是通过主体理性本身达到了荒谬，即最终反对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本身，使之面临着自我毁灭的危险。^①胡塞尔则在《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一书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实证主义思潮对主体理性信仰的崩溃，是“在扼杀哲学”。“如果人失去了这些信仰，也就意味着失去了对自己的信仰，失去了对自己真正存有的信仰。”^②欧洲人性本身的危机就在于丢失了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

现象学、批判理性主义，包括解释学反对与非议科学主义的工具理性，实际上是用一种完全的理性主义来反对残缺不全的理性主义，因而从根本上说，它们同属于一个理性主义的阵线。不同的是，前者不像后者那样形式化、工具化了主体理性而丢弃了理性主体，而是分别从自我学与非自我学的不同基点出发，通过各自的独立研究与批判，使得近代哲学的理性独白变为理性共识，工具理性变为交互理性，个体主体变为交互主体，认知主体变为实践主体，变换与扩展了主体理性与理性主体的内涵。

众所周知，胡塞尔受启于笛卡尔与康德的主观主义哲学，但他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处则在于：不是坚持“我思”的明证性、彻底性而囿于“唯我论”，而是基于没有成见的“自我论”力图去超越“唯我论”，从“单个的主体”转向“复数的主体”，从“唯我论的自我学”转向“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尽管胡塞尔从对主体自识的可能性分析出发，中经对主体间互识的可能性分析，最后到对交互主体共识的可能性分析，整个思路的进展都是循着他称为“先验演绎”的道路，并从始至终都基于“先验自我”的直观明证性上，因而主体理性的意向性、构成性与超越性，

^① 参见张汝伦《历史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9—300页。

^② [德] 胡塞尔：《欧洲科学的危机和超验现象学》，张庆熊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